

【土地问题】

土地流转、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转型

——基于湖北省京山J村的调查

刘锐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以户籍在村的家庭为基础,结合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用社会资源作为农民分层标准,同时纳入土地变量,将J村农户分为脱离土地阶层、外出务工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小农兼业阶层、村庄贫弱阶层。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地位秉赋、政治态度、社会表现不同,维护基层秩序的能力和动力也有差异。在阶层分化的条件下,乡村治理应该适时转型,深入调查农民阶层的发展状况,有针对性地加强治理能力建设,整合阶层利益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推动农村政治发展。小农兼业阶层是当前农村的中间阶层,他们是融洽阶层利益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秩序,发扬基层社会民主,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力量,应该得到积极培育和支持。

关键词:土地流转;阶层分化;乡村治理转型;阶层利益;中间阶层

中图分类号:F301.3;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3)02-0092-09

一、引言

目前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土地流转的经济效益研究;二是土地流转的政治后果研究;三是土地流转的社会后果研究;四是土地流转对乡村治理影响的研究。限于论文篇幅,笔者重点梳理农村土地流转的社会后果及对乡村治理影响的相关研究。

关于土地流转的社会后果研究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土地流转对农村发展及社会稳定影响的研究。相关研究表明,土地不但具有生产资料的功能,而且具有社会保障的功能^[1],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土地的保障功能不可忽视^[2]。除此之外,土地还具有生态环保、粮食安全、农村发展等其他社会功能^[3]。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农地可为农

民提供就业,从而保障社会稳定^[4]。二是土地流转对农民分化影响的研究。相关研究认为,放开土地流转,农民可能很快失去土地,造成农民两极分化及农民贫民化的后果^[5-6]。土地流转已成为农民流动的社会阶梯,其重构的农民阶层结构也日渐定型化^[7]。在后税费时代,农村阶层出现新情况,不同农民阶层的土地收益依赖程度、土地流转意愿、对乡村秩序的态度不同^[8-9]。1990年中后期以后,以土地自发流转为载体,逐渐形成“中农”阶层,该阶层由于其秉赋特征,在农村社会扮演重要角色,是村庄交往的主要力量^①。在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的背景下,中农阶层保证了农村的稳定,促进了农村的市场化^[10],造成乡村治理特有的“中农现象”,是“中国隐性农业革命”的社会学展现^[11]。

土地流转不仅与宏观的经济效率、社会发展、

收稿日期:2012-09-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CKS01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10491142)

作者简介:刘锐,男,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应用和乡村治理研究。

① 华中村治学者对“中农”阶层的研究较为深入,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详见贺雪峰,当下中国亟待培育新中农[J],人民论坛,2012(13);杨华,农村土地流转与社会阶层的重构[J],重庆社会科学,2011(5);刘锐,中农治村的发生机理[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徐嘉鸿,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中农现象[J],贵州社会科学,2012(4);袁明宝,积极培植“新中农”阶层[J],中国老区建设,2012(1);林辉煌,江汉平原的农民流动与阶层分化[J],开放时代,2012(3)。

政治稳定有关,而且与微观的乡村治理关系密切。有研究认为,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不仅引起农民收入、就业、身份的变化,而且会推动村庄治理模式发生变化^[12]。当前的土地流转和人口流动使乡村社会变得日益多元,推动村民自治向新型农村社区自治转型^[13]。各地农村的社区建设表明,建构与土地流转相适应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必须合理划定社区规模,搞好组织重构、社工队伍、服务下乡等方面的建设^[14]。大规模土地流转消解了农村社会的中坚力量,对农村稳定造成不利影响^[15-16]。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必须避免出现土地的大规模兼并,避免大批农民丧失经营主体地位,不得不沦为雇农的现象^[17]。土地流转应该也必须讲政治^[18],具体说来,需要在重塑基层治理能力的基础上谨慎推行^[19-20]。

学界将阶层视角纳入土地流转的社会后果研究引人注目,但大量研究集中在探讨农村“中间阶层”形成与消逝的过程、机制、后果,缺乏对农村各阶层特征秉赋的深入研究;其次,相关研究多是论证土地流转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系,对土地流转、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转型间的内在机制论述不多;再者,对农村分层标准、阶层利益与关系的分析说明言之寥寥。

而关于土地流转对乡村治理影响的论述多停留在宏观层面,缺乏微观论证以及对农民生活的考察;其次,以农民阶层分化作为分析视角的研究较少,且既有研究多是从侧面触及,点到为止,不够全面和立体,使我们难以理解土地流转对乡村治理的影响逻辑;再者,部分研究对土地流转与乡村治理关系的论述较为宽泛,关于土地流转方式与乡村治理内容的关联机制语焉不详,逻辑论证上易被人诟病。

有鉴于此,笔者试图把土地流转与阶层分化的关系,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转型的关系梳理出来,以理解各农民阶层的利益特点、关系建构、土地情结及对村治的影响,进而勾勒出新形势下乡村治理的总体趋势和基本原则。

在广大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土地流转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农户之间自发的土地流转,一种是外来资本或行政力量推动的大规模土地流转。从现实来看,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大部分地区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和租赁市场不太活跃,农户自发的土地流转构成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主体^[21],本文主要探讨农民自发土地流转的机制、后果及其对乡

村治理的影响。

二、土地流转诱致农民阶层分化

J村属丘陵地形,地处江汉平原末端,全村现有人口1200多人,国土面积8000多亩^①,其中水田3000多亩,旱地300~400亩,人均面积2.4亩,有5个村民小组。J村是典型的农业型村庄,农田种植和养殖业是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1980年代中后期,稻米价格持续走低,为维持家计,一些农民外出打工,土地流转由此出现。不过,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流转始于1990年代的“三农”危机,不少农户为逃避税费而抛荒土地,据村干部回忆,当时抛荒土地占全村耕地的50%以上。

1. 不同时期的土地流转

为完成税费缴纳任务,政府一方面提高每亩土地的税费金额,一方面通过压力型体制要求村干部增强税收能力。每块土地承担着固定的税费任务,并不因农户抛荒而发生改变,只有找到新的种田户,才能保证税源稳定,土地转包即成为村干部的急迫任务。J村主要有两种土地流转方式:一是给本村尚在种地的农民说好话,做思想工作,以减免“三提五统”为诱饵来完成土地经营权的转让,或直接给村民小组长派任务,要求他们带头多捡荒地;二是到偏远山区作宣传,动员山区农民搬迁至本村种地,并给予相应的政策优待。对于那些因故不能外出打工,或者被市场竞争淘汰回村的农户来说,各种优惠措施与“不想种地还不成”^[22]的心理夹杂在一起,形塑出当时农民种地的无奈与辛酸。不过,税费负担沉重并不意味着它对所有农户的经济社会影响相等,对于那些有经营头脑、关系网络好、肯吃苦耐劳的农户来说,他们会选择转入一些较好的田地耕种,根据社会需要、政策制度、家庭结构做出较为合理的土地使用方式来获取经济收益。

土地确权前农户因人口流动、职业分殊而出现利益分化,但并没有出现相应的阶层特征和阶层意识,对于那些从事非农工作的村民来说,土地是负担,只要条件成熟,他们便将户口转移出去,与土地永久脱离关系。进城务工的村民除少数机运较好、风险意识强、能力突出的人可顺利脱离土地外,大部分人还要依托村庄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在沉重

① 本村的亩为大亩,即1亩为1000平方米。

的税费压力下,在村庄生活的农户经济分化不是太大,也没有极强的身份意识和价值归属,他们只是不断抱怨税费高,到处找活计做,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与乡村干部相抗衡。总体说来,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税费改革前的土地流转是乡村干部维持农业基本秩序,利用自身的制度性权力促成的,带有很强的行政诱导和权力干预色彩。

1997 年土地承包到期后,中央决定再延长 30 年时间,鉴于土地抛荒情况严重,农户对二轮承包没有积极性,J 村村干部索性推迟承包时间。2004 年湖北省出台文件要求对农村土地进行“确地确权”,此时农业税费已取消,土地不再是负担,不少外出农民回来要田。从 1980 年代到 2004 年,J 村土地已发生多次流转,回村农户的要田变得麻烦和尴尬,J 村在维持土地现状又不违背省里政策的情况下对土地进行小调整。村干部要求种田大户采取一对一的方式给无地农户 2 亩口粮田,口粮田的位置及等级由两户私下协调。在土地转交过程中,种田大户将那些水源条件差、地力贫瘠、位置较远的土地分给要地者。土地确权当时未回而过两年再回来要田的农户,一般会遭到种田大户的坚决拒绝。与种田大户相比,要地户村庄关系一般,与村干部无甚交情,个人能力不突出,加上不善要蛮斗狠,使得他们中的大部分要么只要到 2 亩田,要么干脆成为失地农户。在屡次找村干部解决,到县市上访无效后,一些农户不再抗争,土地确权格局就此定型。那些当时没要回土地的农户被迫长年累月在外打工,有时过年都不回家;即使要回土地的农户,又很快把土地流转出去,然后夫妻两人外出打工,过年过节回家看望小孩,或打工太累就回村

休息一段时间;在村的农户或者经营养殖业,或者在县城务工,但他们都种着多少不等的土地。

在后税费时期,一些村民因城市就业机会多,非农就业收益高而流出土地;一些人觉得土地收入无关痛痒,便将土地转给兄弟亲朋;对于年龄较大者,因身体不好,便少种些土地,只图个口粮。对于大部分转出土地的农民来说,其土地拥有量都不太多,土地带来的经济效益较小。而种粮大户则是为扩大规模,想尽办法流入小户的土地;养鱼养鸭的农户高价承包水源较好的农田,土地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生产资料,承载着整个家庭经济,须高度重视土地收益。土地的物权属性使 J 村的土地流转更加自由频繁,以土地确权为基础,土地种植规模与农业产出收益逐渐形成质的差异。受家庭生命周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该时期的村民无论是村内还是村外流转土地,都带有较强的短期性与自发性色彩。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种植格局逐渐定型,乡村社会的经济分化明显起来,农民阶层的轮廓开始清晰。

2. 土地流转诱致农民阶层分化

由上述可知,不同时期的土地流转对农民群体的影响不同。后税费时期的土地流转使农户收入来源、生活方式、社会表现、价值取向等方面发生巨大差异,农民阶层分化在农村社会悄然成形。笔者结合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用社会资源作为农民分层标准,并纳入土地变量^①,将 J 村农户分为脱离土地阶层、外出务工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小农兼业阶层、村庄贫弱阶层。笔者详细统计了 J 村两个组 77 户的农户就业收入情况,详见表 1。

表 1 农村阶层分化情况

所属阶层	脱离土地阶层	全家外出务工阶层	半工半农阶层	小农兼业阶层	村庄贫弱阶层
土地占有情况	不耕种土地	大多种 2~5 亩	10 亩左右	15 亩以上	2 亩以下
户数	9	14	23	26	5
占农户比重	11.7%	18.2%	29.9%	33.8%	6.4%
年收入情况	5 万元以上	3 万元左右	2 万~3 万元	3 万~5 万元	不足 1 万元
阶层利益情况	脱离村庄	暂时不在村庄	小部分在村庄	大部分在村庄	全部在村庄
阶层关系情况	一般	一般	较好	很好	一般
对土地态度	不重视	暂时不重视	较重视	很重视	很重视
对村治态度	消极	暂时消极	一般	积极	一般

(1) 脱离土地阶层

该阶层对土地基本上没有依赖,年收入在 5 万元以上,有较多的家庭存款,生活方式高度城市化,

处于村庄最上层。他们或者将土地永久流转出去,

^① 笔者将社会资源操作化为经济资源、社会关系资源、声望资源、政治社会影响,以此确定农民阶层分化的标准。详细论述请参见刘锐. 农民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转型[J]. 中州学刊,2012(6).

或在二轮延包时不要土地。他们的人际网络广泛,综合素质较高,市场竞争能力强,是村庄里的知名人士,被大多数村民尊重和仰慕。J村从1980年代起就有不少人外出经商,他们现在大多在城市定居,多数对农业生产和村庄生活有相当的隔膜,只有少部分人对土地存有精神依恋和价值寄托,并偶尔回村,以重拾乡土记忆,对村庄事务则不以为意。该阶层一般在城市有稳定的工作,或在村里从事非农职业,他们是学界所说的富人阶层^①,享有较高经济社会地位,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农民。

(2) 全家外出务工阶层

该阶层长年在外务工,或做些小本生意^②。他们通常只在家里有急事或者春节期间回家。外出务工阶层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土地确权时没有要回土地的农户。他们因失去土地保障,生活变得漂浮不定,在能够劳动的年龄里,进城拼命挣钱,以备未来的生活风险。二是家里有少量土地,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他们转出土地,然后全家外出打工。这部分农户有2~5亩农田,少数农户的土地接近10亩,家中小孩或者年龄小,或者已成年,父代年龄在50~60岁之间。靠着全家人的精诚合作,他们的家庭年收入在2万~10万元之间。总体说来,该阶层农户流出土地的功利性较强,对土地的依赖性较弱,对村庄生活期待不多,生存充满更多的不确定性。

(3) 半工半农阶层

该阶层以外出务工为主,同时对土地收益有依赖,一般耕种10亩左右的土地,年收入在2万~3万元。半工半农阶层的生产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老人耕种土地,种植菜蔬,保障家庭基本开支,子代外出务工,获得打工净收益;二是妇女种植土地,操持家务,照顾小孩,丈夫外出打工,以打工收入补贴家庭。正是通过家庭分工,农户可以在城乡自如流动。J村每亩土地产出1000斤左右的粮食,农业收益稳定可观,可保证体面的村庄生活。总体说来,该阶层农户不太重视土地的精耕细作,对粮食增产增收的心理期待不高,但他们多半不会流出土地,毕竟耕种土地可保证家庭生活的稳固。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行,农业生产更加简单,劳动投入越来越小,农业收益的获得越发容易,半工半农阶层更不会抛弃田地,举家外出务工。不过,他们对土地生存保障作用的看重及对农业生产效率的不重视使他们在推广轻简便农业和提高农业生产力方面积极性不太高。

(4) 小农兼业阶层

该阶层以农业生产为主,辅助性经营副业,偶尔外出务工,一般种植10亩以上土地,年收入在3万~5万元,在村庄中有一定地位,是当前学术界所称的“中农”阶层。该阶层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一般是夫妻合作经营管理土地,对土地增产增收有较高期待,会花大量时间在土地耕作上,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热心,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方面有较高的热情。该阶层农户的生活期待不高,小富即安的心理严重,生活方式较为悠闲,有村民戏称自己是“三个月过年,三个月农忙,还有半年在打牌”。除去农业生产,他们也去摸鱼摸虾,从事季节性帮工,养鸭养鱼来谋求收入,不过多数农户不看重此部分收入,多是为打发闲暇时间和获得有意义体验。我们调查时发现该阶层不少农户都有在农闲去田地里转悠、看风景的习惯,问何故,有村民解释说,在田埂上走走,看看田地作物,感觉充实满足。正是土地维系农户家计的基础性作用,该阶层农户对国家农业政策、对农药、化肥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涨跌,对农技推广和农业信息更加敏锐,对土地自发流转更有兴趣,对提高土地生产方式、促进农业现代化有更多想法与思考。

(5) 村庄贫弱阶层

该阶层的经济社会地位最低,他们种植的田亩较少,无家庭成员外出打工。在农村保障体系不健全条件下,一些家庭因大病致贫;抑或丧失劳动能力,子代供养不足而致贫。他们多年老体弱,经常生病,家庭经济较差。贫弱阶层多种植2亩左右的田地,年收入不足1万元,他们渴望多种地以增加收入,却难以获取并种好。没有其他收入来源,本阶层农户只能过着最差的生活。总体说来,该阶层对土地有着极强的功能和价值依赖,对小农兼业阶层的生产生活很是向往。

一方面,后税费时代的土地自由流转使农民阶层轮廓逐渐显现,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的农民阶层具有分化不完全,边界不固定,阶层界限模糊,行业分化不平衡,区域不平衡等过渡性特点^[23],这使得阶层间的流动及转化空间极大。对于外出务工阶层来说,一旦就业不充分或务工收入低,将会有部

^① 欧阳静对富人阶层的秉赋特征作过分析,详见欧阳静.富人治村:机制与绩效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11(5).

^② 笔者将做小本生意的农户划入务工阶层,主要考虑是城市不是他们的永久栖息地,与外出务工者一样,他们不是村庄上层阶层,生活充满不确定性,没有长远社会预期。

分家庭成员选择回村种地,并由此沦为半工半农阶层或小农兼业阶层;对于半工半农阶层来说,代际分工和夫妻分工机制的破坏使他们很有可能成为小农兼业阶层;无论是哪个阶层,一旦遭遇到重大家庭变故,都有可能沦为村庄贫弱阶层。阶层间的双向自如流动启示我们在理解不同阶层的政治、社会、文化态度时要有整体眼光和长远视野,多角度多层次思考阶层分化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三、不同阶层的利益特征及相互关系

阶层分化的实质是社会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带来某些阶层利益的损失及各阶层间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24]。要讨论阶层分化对乡村治理的影响,首先要搞清楚不同阶层的现实处境、利益特征及相互关系。基于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政治态度基础上的阶层利益对不同阶层的社会表现及关系建构影响巨大。本部分将对不同阶层的利益特征及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说明,重点阐述不同阶层的政治社会态度。

脱离土地阶层的生产生活基本脱离村庄,除户籍上的村民身份,已很难观察到其言谈举止中所传达出的农民影子。他们的主要经济利益不在村庄,主要社会关系也不在村庄,对村庄基本没有功能诉求。作为村庄生活的过客,他们无须在村庄交往、村庄发展上用心用力,少有人愿意为村级治理建言献策,为公共品供给投资投劳。该阶层是中国农村改革受益最多的群体,掌握着较多的经济社会资源,对改革的认同度较高,不关心土地生产方式变革和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基于自身利益追求土地的非农收益及土地私有化改革,容易采取过激形式表达政治参与和政治建议,不利于政治社会稳定和基层民主发展。但他们在村庄中具有较高的政治影响力,容易成为众望所归的乡村治理主体。

半工半农阶层是城乡“两栖动物”,他们要依托村庄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再在城市获取就业机会并挣得相应收入。打工收益在家庭收入中的较大比重使得他们将工作重心放在外出务工上,一心想着提高工作技能以满足市场需要,农业生产只需保持基本收益即可。该阶层在意村庄人情交往,注意保持融洽的阶层关系,因为他们清楚,家庭生命周期和个人年龄变化将决定他们亦城亦乡的生活。因掌握一定劳动技能,家庭收入在村庄中等,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总体满意,会适时扩大超社区的社会

关系。但受利益重心和关系重心的限制,他们在提高农业生产力方面不甚主动,在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和发展农村公益事业方面态度不太积极,在公共品供给方面有较强的搭便车冲动,因此他们在村庄中的地位 and 声誉一般。总体来说,该阶层成员没有强烈的参政议政冲动,被动配合治理主体和做普通村民的想法强烈。

外出务工阶层一般很难在城市过上体面且尊严的生活,断绝村庄往来并不意味着他们能独立自主,村庄依然是他们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场所。从某个角度讲,他们都是被动举家进城务工,要不是政策执行不公及生存压力所迫,他们不会劳师动众、不计成本地涌入城市。务工收入的不稳定使他们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充满焦虑,渴望获得较多土地以保证生计稳定。该阶层的利益重心和生活重心都在城市,与半工半农阶层相比,他们很难保证正常的村庄人情交往及阶层关系建构,更没有心思参与村庄政治及谋求社会地位。该阶层成员城市化渴望强烈,有较强的卖掉土地换取进城资本的冲动,但城市生活费用上涨、自己收入来源不稳定、家庭成员患病、上学等限制,会使他们面临生存困境与心理折磨。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该阶层成员都是边缘群体,造就出其社会表现的困窘尴尬及政策诉求的矛盾心理。

小农兼业阶层主要靠农业生产获取经济收益,无论是从事养鱼养鸭的副业,还是农闲时节外出务工,都比不上土地收益的根本性和基础性。农业生产需要农户间的互助合作,要想获得较高的农业收益,必须处理好与其他阶层的关系。该阶层一般会以亲切、友善、助人、团结的姿态出现在村庄中,不轻易和其他阶层闹恩怨或结仇,积极联络问候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农业收益的增加需要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该阶层因此会积极介入村庄公共生活,为公益事业发展出谋划策,自告奋勇地担任组织者和宣传者。小农兼业阶层是农村政策改革的受益者,当前国家的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及农业现代化政策也符合他们的利益诉求,造就出其对国家政治系统的高度拥护。他们不仅是各项农村政策的执行主体,而且是反馈政策实施绩效,代表农民群体献言献智的主导群体,是国家农村政策改革的接应力量。与脱离土地阶层相比,该阶层一般会在体制内以合法合理的方式求得问题解决,且他们的参政主张和政策要求温和且保守,一定程度上能够平衡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小农兼业阶层是

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已有研究表明,“中间阶层”因其矛盾的阶层属性而产生地位焦虑感,他们为寻求阶层利益会与社会上层联盟而出现“精英化”取向^[25]。而我们的发现刚好相反,当前的小农兼业阶层没有地位焦虑,他们生活积极、乐观自信,具有较强的自我认同,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场域与富人阶层不一致,利益诉求和文化消费方式也迥异于村庄上层。也因此,小农兼业阶层能超越本阶级利益,关心村庄整体利益,并得到各阶层的认同与支持。

村庄贫弱阶层的主要利益和主要关系都在村庄,但经济上的巨大压力使其在建构阶层关系,参与公益事业方面无能为力,有些农户甚至退出村庄人情往来,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该阶层很难在短期内改变生活困境,对国家优惠政策有高度依赖性,总体上有较强的国家政治认同。客观上来说,不同阶层在文化消费、生活方式、价值审美、人际交往方面会形成差别,很有可能形成一定的观念、情感、文化壁垒,促成阶层排斥和价值否定。因其贫弱,该阶层既对村庄秩序不太关注,也很难在阶层品位上有所提升,在缺少关注,少人帮助时,他们很有可能自我放逐,自我边缘化,成为无赖户,破坏乡村善治。

总体说来,当前J村的农民阶层轮廓显现但并不清晰,不同的阶层内部没有实现充分整合和价值认同,阶层间的边界还很模糊,阶层间的流动还在顺畅进行。阶层结构的不完全定型并不意味着身份差别和阶层壁垒不存在,调整和协调阶层经济利益和社会关系不仅关乎阶层整合,还关乎农村发展和政治稳定。在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如何顺应社会现实,整合阶层利益,促成阶层合作,创新管理体制,是决策者思考乡村治理的关键。

四、农民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转型

一方面,农民阶层分化的进程、特征、利益形态与农民分化的多方面条件相对应,尤其与宏观的政策制度安排相接应;另一方面,农民阶层分化一旦成形,就会反过来影响乡村治理的目标与进程。在阶层分化的条件下,决策者应该从政治整合、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三个方面调整阶层利益关系,促成乡村治理的合理转型。

1. 政治整合

政治整合包括两方面: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

从根本上讲,各阶层的利益是一致的,都统一于伟大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同农民阶层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各阶层间的利益又是有差异的,阶层利益诉求的不同促成其参政议政的方式、内容、目标也不同。执政者既要考虑阶层共性,又要辨别阶层利益差异,尽量满足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利益。占村庄少数的富人阶层掌握着大量的经济社会资源,他们的关系是超社区的,利益是脱离村庄的,政策献言必然会自利性程度高,异质性程度强,很难统合大多数农民阶层的利益诉求。因此,他们应尽量少地成为村治主体,否则,将形成政治排斥、经济排斥、社会排斥,阻碍基层民主的发展。

已有的研究表明,除开少数富人自觉将阶层利益统一于村庄整体利益外,大部分富人当村干部目的是获取经济报酬,利用体制资源扩大私人产业,谋求一己私利,很难真正关注农民公共需求和农业生产发展^①。相较于富人阶层,小农兼业阶层是村庄社会的“中间阶层”,他们的阶层诉求与土地关联比较大,同其他阶层的异质性强,能够代表多数农民群众表达意见、参政议政,从而有效缓冲其他农民阶层的政治诉求压力。该阶层的主要利益在村庄中获得,主要关系在村庄中建构,对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比较了解,能够从村庄整体利益出发表达公共品偏好和农村政策改革方向。他们成为村治主体,不仅能协调阶层利益,维持村庄政治稳定,而且能成为连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要群体,促进村庄政治民主的发扬。不过,小农兼业阶层的治村方式更加的稳健和保守,其政治影响力不会像富人治村那样快速有效。至于外出务工阶层、半工半农阶层、村庄贫弱阶层,他们或者主要利益、主要关系不在村庄,对村庄公共事务消极应对,不具有代表村庄整体利益的阶层属性,或者社会地位较低,缺乏乡村治理应有的能力与资源。因此,笔者认为,从阶层利益的角度考察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小农兼业阶层的阶层秉赋较为符合要求。

2. 经济发展

农村经济发展是与宏观经济结构、国家发展战略息息相关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当前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内需不足、生产过剩,要想促

^① 详见赵晓峰、林辉煌.富人治村的社会吸纳机制及其政治排斥功能——对浙东先锋村青年农民精英治村实践的考察[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0(4);贺雪峰.论富人治村——以浙江奉化为讨论基础[J].社会科学研究,2011(2).

进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就必须拉动内需,刺激生产发展,农民群体又占中国社会的大多数。因此,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需求是推动国家发展的关键。从短期来看,要刺激农民消费需求,消化过剩的制造业产品,同时大力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从长期来看,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改变农地产权结构,加快土地流转,废除歧视性的户籍制度,鼓励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进城市。他们认为,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农村富余劳动力将很快被完全吸纳入城市,从而改变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情况,彻底消灭农村和农民。问题在于,我国目前的农村人口数量为8.8亿左右,以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高速发展为前提,即使未来50年内城市化人口速度由30%增至50%,农村仍将有7~8亿人口^[26]。限于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及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城市打工的农民不能获得充分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经济报酬,一旦遭遇类似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他们必将大批返乡务农。对于半工半农阶层和外出务工阶层来说,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的土地将保障他们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无须为生活不确定性和未来的风险性焦虑徘徊。另一方面,中国十八亿亩耕地上的九亿农民的大多数只能种植大田作物,这是低生产率和低效的农业,在市场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九亿农民为三亿市民搞饭吃,农业生产收益不可能大幅增长,相反,农民生产的农产品越多,越是不值钱,增产不增收的情况在中西部农业型地区普遍存在。总体说来,无论外出打工还是在家务农,都不可能获得较高收入,中国经济体系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短时期内不可能改变,在未来的50年里,大部分农民依然要依托村庄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农民将长期生活在“温饱有余、小康不足”^①的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剧烈的人口流动,农村社会空心化严重;随着市场经济的强力渗透,人际关联变得越来越理性化工具化冷漠化;随着村庄社会边界的开放,村庄共同体解体,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地方规范瓦解,农民沦为“无公德的个人”^[27]。宏观结构性限制和村庄现实状况决定了乡村治理的重要任务是维护基层社会稳定而非带领农民致富,当前少数人因其较强的市场意识、较强的个人素质和较好的社会机遇而发家致富,跻身为村庄富人阶层的事例并不具有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期望吸纳将富人入党并纳入治理体制,通过“双带工

程”实现共同富裕的策略即使能在个别村庄实现,也不宜在全国推广,更不应上升到政策层面^[28]。在阶层分化的条件下,决策者一方面要保证村庄公共物品和公共秩序的有效供给,为各阶层的自如发展和自由流动提供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要防止村庄中上阶层制造身份壁垒,限制阶层自由流动,非法占有社会利益的情况。就当前的阶层分化情况来看,村庄是农民生产、生活、交往、娱乐、获得价值体验的场所,小农兼业阶层的利益与村庄整体利益高度契合,他们对村庄秩序的追求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相较于其他阶层,他们更有可能为追求稳定的经济秩序做出身体力行的实践,协调好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空间。

3. 社会稳定

搞好社会稳定要注意农村阶层结构和各阶层的秉赋特点,协调好阶层关系。一方面,阶层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关系,协调好阶层利益就要保障各阶层有自主谋利的空间,促成阶层间的互惠合作,保障利益共享而非有所偏袒,依法规范不同阶层的谋利行动,保障边缘群体的基本生活,让中下阶层尽快富裕起来,增强其向上流动的能力。另一方面,阶层关系不仅涉及经济利益和收入分配关系,还涉及社会地位和政治权益,和谐的阶层关系包括社会各阶层间的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社会各阶层间的互惠互利关系^[29]。只有反映并兼顾不同阶层的利益及其关系,尽量保证各阶层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才会获得全体村民的广泛认同,增强乡村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对于乡村治理主体来说,他们要在两个方面用力:一是发挥政治权力优势,在进行制度建设时为协调阶层利益预留空间,缩小阶层利益差异,保证利益关系的平衡。如当前的村庄富人阶层因其巨大的经济优势、文化优势很容易获得政治权力的垂青,成为事实上的乡村政治精英,形成总体资本累积,造成阶层利益垄断和“超级权势”的出现,催生阶层矛盾和阶层冲突。同时,村庄中间阶层社会声誉的获得主要基于其平民姿态及融洽的阶层交往,这种社会关系资源尽管稳定有效,却并不如村庄上层阶层的政治影响力广大,在实际的乡村治理中很容易被资本或权力摧毁,沦为雇工阶层或务工阶层,引发阶层冲突。另外,现阶段农村阶层的身份

^① 贺雪峰曾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的关系作过探讨,详见贺雪峰,乡村的前途[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界限并不清晰,他们通过市场交换关系、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的地位资本需要政治权力的承认与授予,各阶层紧张的对立与冲突并不存在,当前发生的阶层冲突多与对政府阶层整合不力相关^①。这要求决策者对各阶层的现状和发展做出相应分析,在坚持政治方向正确的前提下加强治理能力建设。同时充分发挥好阶层的自发调节作用,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中间阶层。总之,农村社会稳定与阶层关系调节和乡村治理能力建设密切关联,保证阶层关系的融洽、阶层流动的自如、阶层获利机制的公平是乡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

五、结语

土地流转不仅带来经济分化,而且带来阶层分化,这对乡村治理提出新要求。在阶层分化的条件下,乡村治理应该适时转型,深入调查农村阶层现状和发展情况,有针对性地加强治理能力建设,整合阶层利益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稳定,推动农村政治发展。小农兼业阶层是当前农村的中间阶层,他们是融洽阶层利益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秩序,发扬基层社会民主,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力量,应该得到积极培育和支持。

致谢:本文观点的形成得益于与杨华博士、孙新华博士的讨论,特此感谢。

参考文献:

[1] 朱光. 以人为本,构建农村和谐土地流转关系[J]. 学术论坛,2007(2).

[2] 姚洋. 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

[3] 温铁军. 征地与土地制度[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4] 陈柏峰. 农地的社会功能及其法律制度选择[J].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2).

[5] 贺雪峰. 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6] 温铁军. 农村政策的底线是不搞土地私有化[J]. 中国市场,2008(16).

[7] 陈文成,罗忠勇. 土地流转:一个农村阶层结构再构过程[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4).

[8] 贺雪峰.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阶层及其分析[J]. 社会科学,2011(3).

[9] 陈柏峰. 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J]. 中国农村观察,2009(4).

[10] 陈柏峰. 中国农村市场化发展与中间阶层——赣南车头镇调查[J]. 开放时代,2012(3).

[11] 杨华. “中农”阶层:当前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J]. 开放时代,2012(3).

[12] 吴晓燕.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村庄治理转型[J]. 政治学研究,2009(6).

[13] 陈世伟,尤琳. 农地制度变迁与农村社会管理[J]. 重庆社会科学,2012(4).

[14] 陈世伟. 地权变动、村界流动与治理转型[J]. 求实,2011(4).

[15] 王德福,桂华. 大规模农地流转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分析——基于皖南林村的考察[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16] 贺雪峰. 论农地经营的规模——以安徽繁昌调研为基础的讨论[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17] 陈锡文,韩俊. 如何推进农民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J]. 中国改革·农村版,2002(9).

[18] 史天健. 土地流转应该也必须讲政治[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19] 刘涛. 土地规模化流转的意愿、实践与逻辑分析——基于河南省H县的调查[J]. 古今农业,2011(2).

[20] 李昌平. 土地流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J]. 农村财政与财务,2010(4).

[21] 张红宇. 中国农地调整与使用权流转:几点评论[J]. 管理世界,2002(5).

[22] 李昌平. 我向总理说实话[M]. 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

[23] 卢福营. 转型时期的大陆农民分化[J].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2000年春季卷.

[24] 陈安存. 试论阶层分化对政治发展的挑战[J]. 唐都学刊,2002(3).

[25] 张宛丽. 中间阶层:具有缓冲与示范功能的社会力量[J]. 中国共产党干部论坛,2005(10).

[26] 贺雪峰. 乡村的前途[M].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27] [美] 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M]. 龚小夏,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28] 贺雪峰. 论富人治村——以浙江奉化为讨论基础[J]. 社会科学研究,2011(2).

[29] 刘军,张志胜. 论构建和谐阶层关系[J]. 行政与法,2006(8).

(责任编辑:刘浩)

^① 陈锋、袁松曾对富人治村引发的阶层抗争作过探讨,详见陈锋、袁松,富人治村下的农民上访:维权还是出气?[J],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3/4期合刊本。

Farmland Transfer, Class Differenti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J Village of Jingshan County, Hubei Province

LIU Rui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 Rural Governanc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vided the households in J Village into five classes——uprooted, migrating laborer, semi-farming and semi-working, farming plus sideline production and disadvantageous——on the basis of permanent village reside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ocial resources and land variables and in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 division and rural governance. The capacity and motivation for maintaining the rural social order vary with the interest appeal, social position predisposition, political attitude and social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rural classes. Under the current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 rural governance should transform its mode, pertinently strengthen its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and readjust the interest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es on the basis of a survey on the rural social hierarchy in order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and boost the rur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farming plus sideline production is the middle class in the rural society and it is a mainstay in harmonizing the class interest relationship, maintaining rural social order, promoting rural democracy and realiz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hence it should be cultivated and supported.

Key words: Farmland Transfer; Class Differentiatio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Class Interests; Middle Class